

πολιτικ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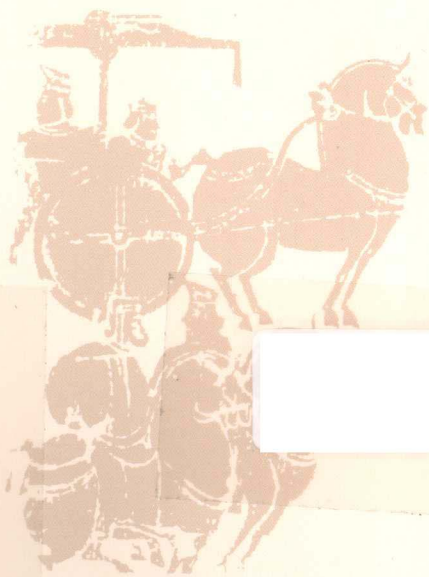
政治哲學文庫

甘阳 刘小枫 | 主编

彭磊 著

苏格拉底的明智

——《卡尔米德》绎读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πολιτικά

政治哲學文庫

甘阳 刘小枫 | 主编



彭磊 著

苏格拉底的明智

——《卡尔米德》译读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苏格拉底的明智:《卡尔米德》绎读/彭磊著.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15. 5

(政治哲学文库)

ISBN 978-7-5080-8496-1

I. ①苏… II. ①彭… III. ①苏格拉底(前 469~前 399) — 哲学思想 — 研究 IV. ①B502. 23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09234号

苏格拉底的明智:《卡尔米德》绎读

作 者 彭 磊

责任编辑 马涛红

责任印制 刘 洋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少明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少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15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6.625

字 数 120 千字

定 价 29.80 元

华夏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网址:www.hxph.com.cn 电话:(010)64663331(转)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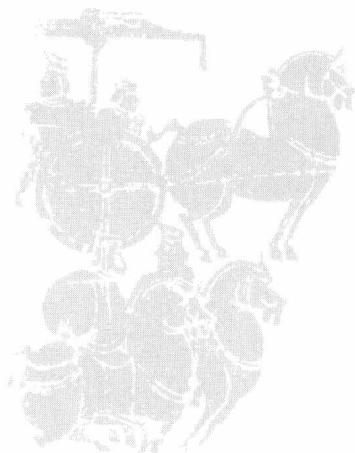
πολιτικά

我(苏格拉底)跟得上你的道路吗?我说,你说的那门专业似乎指政治专业,而且还许诺把男子教成好的政治人?

就是就是,他(普罗塔戈拉)说,苏格拉底哟,这正是我的专职。

真漂亮,我说,你搞到的这门专业漂亮,要是你真的搞到了的话——我没法不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尤其对你,——其实,我自己一直以为,普罗塔戈拉噢,这专业没办法教。可你现在却那样子说,我不知道该怎么看你的话。不过,为何我觉得这专业不可传授,没法由一个人递给另一个人,还是说清楚才好。

——柏拉图,《普罗塔戈拉》,139a2-319b3



子曰：

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
可与适道，未可与立；
可与立，未可与权。

——《论语·子罕》

总 序

甘 阳 刘小枫

政治哲学在今天是颇为含混的概念,政治哲学作为一种学业在当代大学系科中的位置亦不无尴尬。例如,政治哲学应该属于哲学系还是政治系?应当设在法学院还是文学院?对此我们或许只能回答,政治哲学既不可能囿于一个学科,更难以简化为一个专业,因为就其本性而言,政治哲学是一种超学科的学问。

在 20 世纪的相当长时期,西方大学体制中的任何院系都没有政治哲学的位置,因为西方学界曾一度相信,所有问题都可以由各门实证科学或行为科学来解决,因此认为“政治哲学已经死了”。但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政治哲学却成了西方大学内的显学,不但哲学系、政治系、法学院,而且历史系、文学系等几乎无不辩论政治哲学问题,各种争相出场的政治哲学流派和学说亦无不具有跨院系、跨学科的活动特性。例如,“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在哲学系、政治系和法学院同样激烈地展开,“共和主义政治哲学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挑战”则首先发端于历史系(共和主义史学),随后延伸至法学院、政治系和哲学系等。以复兴古典政治哲学为己任的施特劳斯政治哲学学派以政治系为大本营,同时向古典学系、哲学系、法学院和历史系等扩展。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把文学系几乎变成了政治理论系,专事在

各种文本中分析种族、性别和族群等当代最敏感的政治问题,尤其福科和德里达等对“权力—知识”、“法律—暴力”以及“友爱政治”等问题的政治哲学追问,其影响遍及所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后,女性主义政治哲学如水银泻地,无处不在,论者要么批判西方所谓“个人”其实是“男性家主”,要么强烈挑战政治哲学以“正义”为中心无异于男性中心主义,提出政治哲学应以“关爱”为中心,等等。

以上这一光怪陆离的景观实际表明,政治哲学具有不受现代学术分工桎梏的特性。这首先是因为,政治哲学的论题极为广泛,既涉及道德、法律、宗教、习俗以至社群、民族、国家及其经济分配方式,又涉及性别、友谊、婚姻、家庭、养育、教育以至文学艺术等表现方式,因此政治哲学几乎必然具有跨学科的特性。说到底,政治哲学是一个政治共同体之自我认识和自我反思的集中表达。此外,政治哲学的兴起一般都与政治共同体出现重大意见争论有关,这种争论往往涉及政治共同体的基本信念、基本价值、基本生活方式以及基本制度之根据,从而必然成为所有人文社会科学共同关切。就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再度兴起而言,其基本背景即是西方所谓的“60年代危机”,亦即上世纪60年代由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引发的社会大变动而导致的西方文化危机。这种危机感促使所有人文社会学科不但反省当代西方社会的问题,而且逐渐走向重新认识和重新检讨西方17世纪以来所形成的基本现代观念,这就是通常所谓的“现代性问题”或“现代性危机”。不妨说,这种重新审视的基本走向,正应了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多年前的预言:

彻底质疑近三四百年来的西方思想学说是一切智慧追求的起点。

政治哲学的研究在中国虽然才刚刚起步,但我们以为,从一开始就应该明确: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不是要亦步亦趋与当代西

方学术“接轨”，而是要自觉形成中国学术共同体的独立视野和批判意识。坊间已经翻译过来不少西方政治哲学教科书，虽然对教书匠和应试生不无裨益，但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其视野和论述往往过窄。这些教科书有些以点金术的手法，把西方从古到今的政治思想描绘成各种理想化概念的连续统，盲然不顾西方政治哲学中的“古今之争”这一基本问题，亦即无视西方“现代”政治哲学乃起源于对西方“古典”政治哲学的拒斥与否定这一重大转折；还有些教科书则仅仅铺陈晚近以来西方学院内的细琐争论，造成“最新的争论就是最前沿的问题”之假象，实际却恰恰缺乏历史视野，看不出当代的许多争论其实只不过是用新术语争论老问题而已。对中国学界而言，今日最重要的是，在全球化时代戒绝盲目跟风赶时髦，始终坚持自己的学术自主性。

要而言之，中国学人研究政治哲学的基本任务有二：一是批判地考察西方政治哲学的源流，二是深入梳理中国政治哲学的传统。有必要说明，本文库两位主编虽近年来都曾着重论述施特劳斯学派的政治哲学，但我们决无意主张对西方政治哲学的研究应该简单化为遵循施特劳斯派路向。无论对施特劳斯学派，还是对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共和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等，我们都主张从中国的视野出发深入分析和批判。同样，我们虽强调研究古典思想和古典传统的重要性，却从不主张简单地以古典拒斥现代。就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而言，我们以为更值得注意的或许是，各主流派近年来实际都在以不同方式寻求现代思想与古典思想的调和或互补。

以自由主义学派而言，近年来明显从以往一切讨论立足于“权利”而日益转向突出强调“美德”，其具体路向往往表现为寻求康德与亚里士多德的结合。共和主义学派则从早年强调古希腊到马基雅维里的政治传统逐渐转向强调罗马尤其是西塞罗对西方早期现代的影响，其目的实际是缓和古典共和主义与现代社

会之张力。最后,施特劳斯学派虽然一向立足于柏拉图路向的古典政治哲学传统而深刻批判西方现代性,但这种批判并非简单地否定现代,而是力图以古典传统来矫正现代思想的偏颇和极端。当然,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各派仍然对古典和现代都持激进的否定性批判态势。但我们要强调,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各种流派无不从西方国家自身的问题出发,因而必然具有“狭隘地方主义”(provincialism)的特点,中国学人当然不应该成为任何一派的盲从信徒,而应以中国学术共同体为依托,树立对西方古典、现代、后现代的总体性批判视野。

中国政治哲学的开展,毫无疑问将有赖于深入地重新研究中国的古典文明传统,尤其是儒家这一中国的古典政治哲学传统。历代儒家先贤对理想治道和王道政治的不懈追求,对暴君和专制的强烈批判以及儒家高度强调礼制、仪式、程序和规范的古典法制精神,都有待今人从现代的角度深入探讨、疏理和发展。近百年来粗暴地全盘否定中国古典文明的风气,尤其那种极其轻佻地以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标签一笔抹煞中国古典政治传统的习气,实乃现代人的无知狂妄病,必须彻底扭转。另一方面,我们也并不同意晚近出现的矫枉过正,即以过分理想化的方式来看待儒家,似乎儒家或中国古典传统不但与现代世界没有矛盾,还包含了解决一切现代问题的答案,甚至以儒家传统来否定“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传统。深入研究儒家和中国古典文明不应采取理想化的方式,而是要采取问题化的方式,重要的是展开儒家和中国古典传统内部的问题、矛盾、张力和冲突;同时,儒家和中国古典传统在面对现代社会和外部世界时所面临的困难,并不需要回避、掩盖或否认,倒恰恰需要充分展开和分析。中国政治哲学的开展,固然将以儒家为主的中国古典文明为源头,但同时必以日益复杂的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为动力。政治哲学的研究既要求不断返回问题源头,不断重读古代经典,不断重新展开几百年甚至

上千年以前的古老争论,又要求所有对古典思想的开展,以现代的问题意识为归依。古老的文明中国如今已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现代国家,处于前所未有的全球化格局之中,我们对中国古典文明的重新认识和重新开展,必须从现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复杂性出发才有生命力。

政治哲学的研究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无论是批判考察西方政治哲学的源流,还是深入疏理中国政治哲学传统,都有待学界同仁共同努力,逐渐积累研究成果。但我们相信,置身于21世纪开端的中国学人正在萌发一种新的文明自觉,这必将首先体现为政治哲学的叩问。我们希望,这套文库以平实的学风为我国的政治哲学研究提供一个起点,推动中国政治哲学逐渐成熟。

2005 年夏

目 录

一、引言 /	1
二、雅典 /	11
三、最美的人 /	24
四、欺骗 /	39
五、卡尔米德的明智 /	69
六、克里提阿的辩护 /	101
七、关于知识的知识 /	131
八、尾声 /	158
附录 卡尔米德 /	163
参考文献 /	197

一、引言

《卡尔米德》以对话者的名字命名,而柏拉图以对话者的名字命名的对话共计 25 篇。看到这个标题,我们不可能推知对话的主题是什么,我们的第一反应只可能是:卡尔米德是谁?

苏格拉底问了同样的问题,但他同时还问卡尔米德“是谁的”(τίς τε καὶ τοῦ, 154a)。在苏格拉底看来,卡尔米德“是谁”与卡尔米德“是谁的”这两个问题不可分割,要认清卡尔米德“是谁”,必须同时搞清楚他“是谁的”。卡尔米德“是谁的”,既可能是在追问卡尔米德的家世,即“谁的儿子”,也可能在追问卡尔米德属于谁——谁是卡尔米德灵魂的主人。随着对话的展开,我们将渐次看清卡尔米德灵魂的主人是谁;而在前一个层面上,我们也要特别注意卡尔米德的家世。如后续的对话所见,苏格拉底不止一次强调卡尔米德高贵的家世(154e, 155a, 157e – 158a, 158b)。苏格拉底在跟第俄提玛学习爱欲时,他首先问的问题之一就是爱若斯的父母亲是谁(《会饮》203a);初遇泰阿泰德和吕西斯,他也问了类似的问题(《吕西斯》204e,《泰阿泰德》144b)。^① 父母是一个人最初的教育者,询问一个人的生身父母是谁,也相当于在追问一个人灵魂的由来。

对于卡尔米德的家世,这篇对话本身提供了充足的信息。我们

① D. Hyland,《哲学的美德》(*The Virtue of Philosophy: An Interpretation of Plato's Charmides*), Ohio University Press, 1981, 页 30 – 31。

一步步得知,卡尔米德出自雅典的名门望族,他是格劳孔之子(154b),祖上跟高古的政治家兼诗人梭伦是亲戚和朋友(155a);父家出自德若庇德斯(Dropides)之子克里提阿(亦即对话者克里提阿的祖父,《蒂迈欧》20e 称梭伦是德若庇德斯的亲戚和朋友),曾受到阿纳克瑞翁(Anacreon)、梭伦等诗人们的赞美;母家同样不凡,卡尔米德的舅舅毕里兰佩(Pyrlampes)曾经出使波斯和其他邦国(157e-158a)。在柏拉图笔下,卡尔米德家世之显贵恐怕是绝无仅有的,连阿尔喀比亚德都自叹弗如。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信息几乎都是苏格拉底告诉我们的(除了154b),这说明苏格拉底对卡尔米德的家世极其熟悉。因此,当他问卡尔米德“是谁的”时,他只是在问他已经知道的东西,他对卡尔米德的“无知”很可能是假装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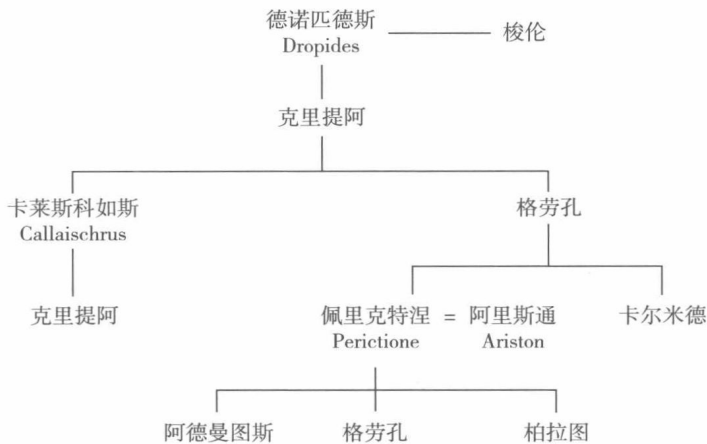
对话中的卡尔米德接近18岁(154b),被认为是他的同辈人中最美的(154a)——不仅外表美,身材也美(154c)——而且有大量追随者,这似乎隐喻了卡尔米德(Χαρμίδης)之名的词根χάρις[美、媚力、恩宠]。克里提阿还说,卡尔米德既爱智慧又会作诗(155a)。这些特征使卡尔米德成为柏拉图笔下明星级的角色,也使《卡尔米德》成为柏拉图极其华丽的对话。

卡尔米德还见于柏拉图的其他对话。《普罗塔戈拉》(315a)提到,格劳孔之子卡尔米德也出现在卡利阿斯家的智术师大会上;《忒阿格斯》(128e)中,苏格拉底说自己打小心中就有个精灵,指示他远离自己将要做的事情,这个精灵阻止苏格拉底行动。这时,苏格拉底以卡尔米德为例说,格劳孔之子卡尔米德已经变得如此美,有次碰巧告诉苏格拉底他要去锻炼,准备参加涅嵎竞技会,他刚开始说自己要去锻炼,苏格拉底就阻止他说:“你说话的时候,我听到了精灵的声音:不要训练。”卡尔米德说:“它很可能告诉你我不会赢,即便我不会赢,这段时间进行训练,我会受益。”于是卡尔米德进行锻炼。由于这场锻炼,卡尔米德似乎遭到不幸,故而苏格拉底说“值得听听他由于这次训练遭到的不幸”。在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III.7处,苏格拉底特

别欣赏卡尔米德的政治能力,鼓励他克服自己对公民大会不应该的不尊重,积极参与雅典政治。在色诺芬的《会饮》中,卡尔米德是苏格拉底的一个同伴。

另一位对话者克里提阿是卡莱斯科如斯(Callaischrus)的儿子(153c,169b),他是卡尔米德的堂哥和监护人(154b,155a)。这位克里提阿日后将成为推翻雅典民主的“三十僭主”的头目,由此恶名昭彰。克里提阿的分量远重于卡尔米德,对话后半部分转变为苏格拉底与克里提阿的对话(162c1-175d5),其篇幅也远远长于苏格拉底与卡尔米德的对话(158d7-162b11),但柏拉图为什么不以“克里提阿”为题?回答这一问题,需要搞清楚对话前后两部分的关系。

综合克里提阿、卡尔米德的家世及其与柏拉图的关系,我们得到如下谱系图:^①



卡尔米德的家世及其与柏拉图的关系

① 这一系谱参见 Luc Brisson,《柏拉图的书简》(Platon: *Letters*), Paris, 1987, 页 57, 另参该书页 22-23 的说明。实际上,柏拉图的家谱是一笔糊涂账,除了确定他的两个兄弟以及卡尔米德与克里提阿的关系外,其他都是后世传说。见拙编,《叙拉古的雅典异乡人:柏拉图〈书简七〉探幽》,王师、马涛红译,华夏出版社,2010,页 40-44。

卡尔米德是柏拉图的亲舅舅,克里提阿则是柏拉图的表舅。《卡尔米德》所隐含的这层关系使它最为接近《王制》:《王制》中的阿德曼图斯和格劳孔是柏拉图的兄弟。当然,无论是《卡尔米德》还是《王制》,都没人提到柏拉图。《卡尔米德》发生在公元前429年(另说为431年),当时柏拉图还没出生。

接下来,我们要为《卡尔米德》在柏拉图对话作品中的位置定位。按照现代柏拉图研究的归类,《卡尔米德》属于柏拉图早期的对话作品,属于伦理类而非哲学类对话,属于无解的对话(aporetic dialogue)。这三个标签背后,是现代古典学术深刻的历史主义和科学主义倾向。

古人并不按早中晚的分期来理解一位作家的作品。诸如公元一世纪时,忒拉绪洛斯(Thrasyllus)以四联剧的形式编排柏拉图的作品,就绝非按照柏拉图写作的先后顺序,否则《苏格拉底的申辩》就成了柏拉图的处女作。亚里士多德仅在《政治学》(II.6)中说到《法义》写于《王制》之后,除了这一条古代证言,柏拉图对话的编年问题可说完全是现代科学化计量分析的发明,兴起于十九世纪末,其始作俑者可以推到英国学者坎贝尔(Lewis Campbell)。1867年,坎贝尔的《智术师》《治邦者》合校本(*The Sophistes and Politicus of Plato*)问世,他依据语言和风格推断两部对话写作时间较晚,而《斐勒布》《蒂迈欧》《克里提阿》《法义》有类似的特征,同样属于晚期作品。他还注意到,《泰阿泰德》《斐德若》《王制》的风格非常接近上面的几部对话。这一推断实际已经指出了其后对柏拉图作品中晚期的基本划分。受坎贝尔的语言分析手段启发,德国学者着手建立柏拉图对话的编年体系。狄腾伯格(Wilhelm Dittenberger)和李特(Constantin Ritter)等人确立了早中晚的分期,而坎贝尔在1896年的一篇文章(“On the Place of the Parmenides in the Chronological Order of the Platonic Dialogues”, *Classical Review* 10, pp. 129-136)中明确

将《帕默尼德》与《王制》《泰阿泰德》《斐德若》《王制》划为中期作品。

分期说表面上基于语言学的计量分析,实际暗含着对柏拉图“成长之路”的历史主义理解。从内容上考虑,一般认为柏拉图早年还笼罩在苏格拉底的阴影之下,还没有形成独立而成熟的思考,故而早期对话主要刻画苏格拉底,以苏格拉底为主人公,为苏格拉底辩护(如《申辩》《克力同》等),并且探讨某个伦理观念(如《拉克斯》《卡尔米德》《游叙弗伦》等),还没有出现对“理念”的哲学探讨;从《会饮》《斐多》《克拉底鲁》开始,柏拉图迷上了“理念”,从伦理学上升到了哲学,探讨“理念”的《王制》《帕默尼德》《泰阿泰德》《斐德若》就是中期对话;在晚期作品中,柏拉图终于超越了苏格拉底,形成了他自己的学说,于是苏格拉底在对话中沉默或消失,改由其他人主导谈话,如《智术师》《治邦者》《斐勒布》《蒂迈欧》《克里提阿》《法义》。^①

所谓无解的对话,是指三部寻求定义而无果的《拉克斯》《卡尔米德》《游叙弗伦》,广义来说,也包括《普罗塔戈拉》《美诺》《吕西斯》《欧绪德谟》。这些对话表面上没有达成最终结论,对话者最后陷入困惑,苏格拉底也自称对所讨论的内容无知,此外,这些对话在形式上也有相似之处:开场便交代对话的场景以及时间,并由苏格拉底作为叙述者。无解的对话被认为是柏拉图从早期到中晚期的过渡性作品,因为,早期对话中的苏格拉底力图证明他人的无知(如《苏格拉底的申辩》所说),中期对话中的苏格拉底则用肯定性的方法构建体系性的理论,无解的对话恰处于两种方法之间,意在使得对话者和读者陷入困惑,从而产生进一步探究的冲动。譬如在《美诺》中,苏格拉底用小

^① Charles H. Kahn,《柏拉图与苏格拉底对话》(Plato and the Socratic Dialogu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页 42 - 48。

奴为例向美诺(Menon)道出了“困惑不解”的好处(84b)。美诺抱怨苏格拉底蛊惑了他,使他在美德问题上变得困惑和木讷,而他之前在这问题上非常健谈(80a-b),而苏格拉底说,小奴此前认为八方尺正方形(double the square)很简单,现在由于认识到自己的无知,故而更愿意寻求答案,从困惑中受益(84c)。^①“无解”这一标签固然注意到了对话的形式特征,但简单地以柏拉图作品的分期来解释这一特征,却有一概而论之嫌,未能对具体对话进行具体分析,忽视了每部对话的独特性。

施特劳斯曾沿用苏格拉底的划分法,从对话形式入手将柏拉图对话分为以下三类:^②

一、苏格拉底对话与非苏格拉底对话,前者即由苏格拉底主导的对话,后者即由其他人主导的对话。在《智术师》《治邦者》《帕默尼德》《蒂迈欧》和《克里提阿》中,苏格拉底大部分时间保持沉默,而在《法义》中,苏格拉底则根本没有出现,取而代之的是一位不具名的雅典异乡人。苏格拉底并非总是柏拉图最高的代言人,当有另一位最高的代言人时,苏格拉底则保持沉默或隐身。

二、苏格拉底自愿进行的对话与被迫进行的对话。^③《苏格拉底的申辩》是苏格拉底被迫进行的对话,《王制》也是苏格拉底

① Charles H. Kahn,《柏拉图与苏格拉底对话》,前揭,页57,95-100,148-150。

② Leo Strauss,《城邦与人》(*City and Man*),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4,页53-60;Leo Strauss,《政治科学的起源和苏格拉底问题》(*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Problem of Socrates: Six Public Lectures*),载 *Interpretation* Vol. 23(2),1996,页127-208,尤其页178-182。

③ 恰如帕斯卡尔所说:“欲念和强力是我们一切行为的根源:欲念形成自愿的行为;强力形成不自愿的行为。”参帕斯卡尔,《思想录》条334,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7,页154。